

试析理学性、情观对“以意为诗”论的影响

程小平^①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中文学院, 北京 100029)

摘要:宋代理学对诗学的影响在何种层面上发生一直众说纷纭。事实上,理学的性、情观对宋人思想观念影响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通过对文人思想结构的改造,理学性、情观影响到此一时期诗人的创作思想。宋人“以意为诗”论中就渗透了理学思想的深刻影响,它同时也铸就了宋人诗歌独特的美学风格。

关键词:理学;性、情(理、欲);以意为诗

宋代理学(本文从广义角度使用这一术语,并非专指程朱道学)对诗学的影响是学界颇为关注的问题。这种影响是多侧面的、复杂微妙的,它可能经过了一系列中间环节的转化、渗透。作为其中的一个环节,理学重要范畴“性”、“情”观深刻地影响了宋人的思想观念,同时也影响到文人士大夫的思想观念和心理结构。通过这种渗透和转换,文人的创作思想也深受影响。宋人“以意为诗”之“意”就包含着“理”的意味,这也就形成了宋诗议论、说理的风格特色。我们将通过一系列梳理说明这一点。

一 宋代理学之“性”、“情”论的含义

宋代理学的成立原因极复杂,其中一个原因与当时文人地位的变化有关。在宋代,士族地主已淡出历史舞台,而庶族地主的地位开始凸显,他们地位的变迁也随之影响到他们对外部世界的思考。宋儒试图对世界重新作解释,以革新贵族统治的理论。先秦儒学比较关注“天命”(“命”);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者认为,“天命”不可违,它确立的生死、富贵及一切特权等级都由先天注定,不可更改。《论语·颜渊》谓“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宪问》云“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都反映了先秦儒者对“命”的笃信。“命”是主宰一切的最终依据。先秦儒学谈论“天命”,一方面可能由于当时生产力落后,对很多问题无能为力,所以只好寻求外在的主宰——“天命”解释一切疑难;另一方面,先秦儒学也有意为当时贵族特权的合法性寻求理论辩护。董仲舒《春秋繁露·对策》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就包含这种思想。

由于生产力在宋代已有较大发展,因此,在认识、改造外部世界时,宋儒要比先秦儒者更有能力;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上,宋儒也比先秦儒者更自信。这种情况使理论的转变顺理成章。宋儒无须悬置外在的“天命”解释现实人事,而是直接从事物内部寻找其存在的终极依据。他们的核心命题由“天

命”转变为“天理”(“理”)。此“理”有两义,一为“物理”,即事物形成、存在的规律,主要指自然的普遍法则;一为“性理”,指人类社会的当然原则,即人类存在的终极依据、生命存在的本体。理学家之天“理”既有本体论意义,同时又是伦理学的普遍规范、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它适用于自然、社会乃至一切具体事物。将万物存在的终极依据由外在“天命”追溯到内在性“理”,这是由外在客体回归到内在主体。它一方面体现了思想流变的内在规律,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人类试图从事物自身寻找其发展变化依据的努力。与早期儒学相比,宋代理学思想的认识论色彩更重。它带来这样一个变化:宋人对事物的认识不再停留于先秦“天人合一”的朴素存在论状态(这种带有较浓厚原始思维色彩的思维倾向于认识者融入对象中去体验对象);^{[1]495}他们不再如前人那样融入对象中去体验事物,而是比较明确地将自我设为认识主体,将认识对象设为客体。这说明他们在认识事物时已倾向于客观地将认识对象置于自身之外,这种一分为二、主客分立的思维是现代认识论的基本雏形。最典型体现这一特点的莫过于宋人“天理”、“人欲”之辩。这是对人类自身能力的确证,是理论上对人类主体性地位的阐发;同时,也是宋儒重新确立世界秩序的一种表现,体现了宋代文人的主体意识。

“理”是两宋思想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它渗透到当时社会生活的各层面,《鹤林玉露》曾记述:“古人观理,每从活处看……明道不除窗前草,欲观其意思与自家一般。又养小鱼,欲观其自得意。皆是于活处看。故曰:‘观我生,观其生。’又曰:‘复其见天地之心。’学者能如是观理,胸襟不患不开阔,气象不患不和平。”^{[2]163}就体现出了这一点。清人总结说:“谈理至宋人而精,说部至宋人而富,诗则至宋而益加细密……宋人之学,全在研理日精,观书日富,因而论事日密。如熙宁、元佑一切用人行政,往往有史传所不及载,而于诸公赠答议论之章,略见其概。至如茶马、盐法、河渠、市货,

① 收稿日期:2008-05-15

作者简介:程小平,男,湖北武汉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文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文学理论研究。

一一皆可推析。”^[3]¹⁹这种思潮自然也影响到文学艺术。宋代“情”、“性”范畴的发展就可以说明这一点。“情”指人类在现实生活中的一切感性经验,包括人的情感、意绪、欲求等等;当“情”转变为“欲”时,它的感性性质更明显。而“性”则指人类本质、本性,即人之所以为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之处。“性”属理性,后转变为“理”范畴。《河南程氏遗书》谓“性即理也,所谓理,性是也”即此意。^[4]“情”、“性”问题即感性与理性问题。在文艺理论中,它涉及主体在作品中创作什么,如何创作等一系列根本性的文艺理论问题。两宋文人通过探讨“情”、“性”与“理”、“欲”等理论问题为文艺创作开辟了新的空间。

程颐在《颜子所好何学论》中说:“觉者约其情使合于中,正其心,养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则不知制之,纵其情而至于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凡学之道,正其心,养其性而已。”^[4]所谓“性其情”,指以“性”规范、改造感性之“情”,这是将情感予以理性化处理的方式。然而,这是否意味他们在重弹“性善情恶”(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之《举贤良对策》、《深察名号》篇中曾提出这一观点)的老调呢?为解决此问题,王安石在《性情》中指出:“喜、怒、哀、乐、好、恶、欲,未发于外而存于心,性也;喜、怒、哀、乐、好、恶、欲,发于外而见于行,情也。性者情之本,情者性之用,故吾曰性情一也……盖君子养性之善,故情亦善;小人养性之恶,故情亦恶……是以知情性之相须,犹弓矢之相待而用,若夫善恶,则犹中与不中也。”^[5]他肯定“情”合法,否定“情恶”论,并将“性”、“情”结合在一起,避免了分裂的尴尬。这表明,王安石并未将情感限制在狭隘的空间内。作为文学家,他知道情感体验对文艺创作的重要性。但作为理学家,他又不得不强调情感触发要合乎理性(即“中”)。

然而,“性”、“情”区别仅在于“未发”、“已发”之间;“情”是否合乎“性”是一种内在自觉,无须外在规范。王安石未明言其“理”何意,但无疑是一种经过内省的理性观念,它在无意中改造了原本鲜活的生命情感,使其蜕变为理性意味浓厚的体验。二程进而将“性”转化为“天理”,将“性之自然”转变为“人欲”。他们在《河南程氏遗书》中指出:“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主于身为心,其实一也”;“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4]从这些论述中人们可以看出“情”、“性”问题究竟如何转变为“理”、“欲”问题。两者对立使情感体验理性化特点更明显。朱熹继承二程,更深入辨析了“天理”、“人欲”的对待性。《朱子语类》指出:“只是一人之心,合道理底是天理,徇情欲的是人欲,正当于其分界处理会……只是这一个心,知觉从耳目之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觉从义理上去,便是道心。”^[6]基于此,他明确提出加强道德修养,要以“天理”战胜“人欲”,“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6]在对“人欲”问题的认识上,朱熹表现了较清醒的理性意识。

众所周知,道德行为必须自觉。理学家强调“性其情”,主张化“人心”为“道心”,“存天理,灭人欲”;用道德理性将人自发的感性冲动予以限制,使人区别于动物;其内在逻辑

是试图以理性本体净化感性之域,它意味着感性情体验要接受理性的规范制约。但同时,道德行为也必须自愿,如果理性对情感经验的处理不适度,使道德主体过于受限制,就会导致理性泛化——“理性化”。理学家从伦理角度出发,强调将当然之则理解为必然之“理”:“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当然之则,而自不容己,所谓理也”;^[7]这意味着天理被赋予某种强制性性质,开始走向其反面。杨国荣《象山语录导读》认为,“道心”作为“理”之内化,更多带有超越个体的性质;但它并非本真自我;而“道心”、“人心”之别,则更表现了超验之理与个体存在的对峙。^[8]在理性化思想主导下,理学家认为文学对穷理尽性不仅无益,反而有害。这种思想无疑给宋代诗学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二 理学“性”、“情”论对“以意为主”之“意”的影响

程颐《文论辑录》记载,(有人)问,“作文害道否?”(程颐)曰:“害也。凡为文不专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局于此,又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也。《书》云:玩物丧志。为文亦玩物也”……先生(程颐)尝说:“王子真曾寄药来,某无以答他。某素不作诗,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于为此闲言语。且如今言能诗,无如杜甫。如云:‘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如此闲言语道出做甚。某所以不尝作诗。”^[9]²¹这表明:理学家完全无须文艺来寄托、安顿他们的情性心灵世界,因为他们已经将感性情感经验转化为理性道德自律,并提升为一种可以安顿心灵的道德境界。因此,他们也从根本上排斥了道德理性以外的其它情感。尽管理学家主要在伦理领域探讨情感与理性问题,但其影响却已超出道德范围而渗透到现实世界,并潜在地影响了现实中人对社会生活、人生世界的看法。由于宋代文人很多本身就是理学家(如王安石、吕本中、杨万里等人),即便不是理学家,也曾多少受其影响(如黄庭坚推崇周敦颐、陆游亲近朱熹等),因此,文人们的“情”、“性”观,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文学观多少也会受到这种理性化思潮的影响。

例如,在“性”、“情”观上,苏轼在《扬雄论》中认为:“苟性而有善恶也,则夫所谓情者,乃吾所谓性也。人生而莫不有饥寒之患,牝牡之欲,今告乎人曰:饥而食,渴而饮,男女之欲,不出于人之性也,可乎?……由此观之,则夫善恶者,性之所能之,而非性之所能有也。”^[10]作为文学家,苏轼肯定情欲出于人性,也合乎人性,因此具有其合理性;但同时苏轼又强调人之“情”必须经过审慎辨析后才可接受。基于这种思想,苏轼还对诗歌创作内容做过极富于道德理性的解释,他在《〈王定国诗集〉叙》中指出:“昔先王之泽衰,然后变风发乎情,虽衰而未竭,是以犹止于礼仪,以为贤于无所止者而已。若夫发于情止于忠孝者,其诗岂可同日而语哉!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9]²⁵⁷这是对宋人诗歌“吟咏情性之正”的详细解释。

黄庭坚《书王之载〈胸山杂咏〉后》也认为:“诗者,人之情性也,非强谏诤于朝廷,怨怒谄于道,怒邻骂坐之为也。

其人忠信笃敬,抱道而居,与时乖逢,与物悲喜;同床而不察,并世而不闻,情之所不能堪,因发于呻吟调笑之声,胸次释然,而闻者亦有所劝勉,比律吕而可歌,列干羽而可舞,是诗之美也。其发为讪谤侵袭,引颈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忿者,人皆以为诗之祸,是失诗之旨,非诗之过也。”^{[9]342}这表明,尽管文人不像理学家那样否定人类情感体验的合理性,但毕竟也不可能像魏晋文人那样率真任性,在情感上他们不能不有所节制。范温《潜溪诗眼》指出:“世俗喜绮丽,知文者能轻之。后生好风花,老大即厌之。然文章论当理不当理耳。苟当于理,则绮丽风花同入于妙;苟不当于理,则一切皆长语。上自齐梁诸公,下至刘梦得、温飞卿辈,往往以绮丽风花累其正气,其过在于理不胜而词有余也。老杜云:‘绿垂风折柳,红绽雨肥梅。岸花飞送客,檐燕雨留人’……皆出于风花,然穷性尽理,移夺造化。”^{[11]326}所谓“当理不当理”,是对文章中所流露情性的理性认识,也是理学家“情性观”在诗学中的具体运用。这一点在宋代诗学“以意为主”论中体现得也很明显。

如果汉魏盛唐人之“意”为“意兴”,那么宋人之“意”当为“意理”;严羽《沧浪诗话》谓“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12]696}是对“意”不同含义的极好解释。宋人刘夙《中山诗话》论诗云:“诗以意为主,文词次之,或意深义高,虽文词平易,自是奇作”;^{[12]285}张表臣《珊瑚诗话》云,“诗以意为主,又须篇中炼句,句中炼字,乃得工耳”;^{[12]45}等等,多论及诗之“意”。此“意”一般被容易简单地理解为“理”,如张耒《与友人论文,因以诗投之》指出,“文以意为车,意以文为马。理强意乃胜,气盛文如驾。理维当即止,妄说即虚假”,^{[9]430}明确指出“意”的核心是“理”。黄庭坚在《与王观复书》中也指出:“好作奇语,自是文章病,但当以理为主,理得而辞顺,文章自然出群拔萃。”^{[9]340}不过此“理”章法与内容兼而有之,涉及到的内容更多。实际上,“意”并非单纯的感性情感,或理性认识,而是兼而有之。

朱熹对此辨析得比较清晰,《朱子语类》云,未动而能动者理也,未动而欲动者意也……问:“情意如何体认,”曰“性情则一。性是不动,情是动处,意则有主向。如好恶是情,好好色,恶恶臭,便是意。”^[6]朱熹将“情”、“意”、“理”等概念用理性语言辨析得十分清楚。由于诗人偏于感性的缘故,他们也许无法对“意”作出深刻的解释,但他们应该注意到“意”与“情”的不同:“意”,不是一般所说的意志之意,而是以想像为主的“思”中,加入了较多的理性的成分。由于“意”是把感情加上了理性,甚至是把感情加以理性化,因此“意”之中已包含了理性因素,它并不能被感性情感完全包容。但是,这种理性化也是对感情的冷却澄汰,冷却由热情而来的冲动,澄汰去实际上是不相干的成分,以透视出所感的内容乃至所感的本质,将其表现出来(此即“宋诗主意”之“意”)。因此,徐复观在《宋诗特征试论》中认为,“意”是经过理性的澄汰而成为更凝敛坚实的感情。^[13]从诗学角度讲,“意”既不是创作中的主题思想,也不仅是作者内心情感。它是作者内心情感通过合适形式所呈现出来的审美意味。这是对作者

内心情感的提纯、澄汰。由于其中已包含了较多的理性因素,因此,“以意为诗”论意味着理性化思潮已深深渗透并影响到诗歌创作,这与作者内心原初的情感体验已产生了一定距离。

然而,宋人诗学中的“理”已大大超出此限度,它泛化为一种基本存在形态,使原本充满灵性的生命体验被严重扭曲僵化而丧失诗意。由于“以意为诗”中已渗入浓厚的理性成分,诗人对要表达的情感有比较清醒的自觉,因此,他们大多在一种有意识的状态中创作诗歌。如吕本中《童蒙诗训》记述:“山谷谓秦少章云:凡始学诗须要每作一篇,先立大意;长篇须曲折三致意,乃能成章。”^{[9]64}这虽是对初学诗者而言,但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以江西诗派为代表的宋代诗人们创作诗歌时大多处在一种较为自觉清醒的有意识理性状态。江西诗人韩驹《陵阳室中语》也说:“作诗必先命意,意正则思生,然后择韵而用,如驱奴隶。今人非次韵诗则任意就韵,因韵求事,至于搜求小说、佛书殆尽,使读之者惘然不知其所以,良有自也。”^{[9]385}更详细地说明了诗人先命意的具体原因。这种清醒的理性意识一方面固然有益于学习诗歌,而另一方面也会损伤诗歌原初的审美诗性,使其表现出过多的人为雕琢。姜夔《白石道人诗说》强调:“诗之不工,只是不精思耳。不思而作,虽多亦奚为。”^{[9]962}这无疑是一种自觉意识的表露,它与汉魏诗歌“不假人为”的创作理念已相去甚远。

三 宋人诗歌情感理性化特点简析

由于理性意识的介入,诗人原初鲜活自然的生命情感已保留无多,取代它的是与当下生命体验有一定距离的、较抽象普遍的人“类”情感经验;这是一种情感“理念”,是理性化、概念化、本质化的生命体验。它表明:宋人对生命情感经验的认识,包括对生命本身的认识已由自发走向自觉,由外向走向内省,由少年时开放、纯真、热情走向暮年时内敛、老熟、节制,这是宋代注重内省的理性思潮必然导出的结果。宋人对“情”的理性自觉使宋诗所表达的内容受到一定限制。相较而言,前期诗学所谓诗“言志”、“缘情”或“吟咏性情”虽都强调作品内容,但并未对其作出具体规定。宋人在承袭前人诗学观念时进行了革新,他们将“吟咏性情”论深化为“吟咏性情之正”的思想。毫无疑问,艺术要表达出人类的生命情感体验。但是,艺术所表达的又并非仅仅是个体私人情感,而还应是一种能被其他人所认同、接受的生命体验。在一定意义上,它是一种表达人类本质的、理性的、概念性情感。宋代理学对诗学的主要影响恰恰就在于:它使汉魏盛唐时代偏于表达个体感性生命情感的诗歌转变为偏于表达共同理性生命体验的诗歌。这也是理学对诗学的积极影响所在。其成功代表者即理趣诗——它的审美特点就是表达了人类的共同理性生命体验(即哲理感悟)。这既是宋代诗歌最具特色之处,也是引发争议最多之处,这从宋人诗歌创作中可以得到验证。

例如,王安石《江上》云:“江北秋阴一半开,晚云含雨却低回。青山缭绕疑无路,忽见千帆隐映来”;《登飞来峰》云:“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

身在最高层”。从表面上看,这两首写景之作不像传统诗歌那样情景交融,而是在景物描写中蕴含深刻的人生感悟与生活哲理,因而有其独特艺术价值。“青山缭绕疑无路,忽见千帆隐映来”于无路之中忽见千帆,给人豁然开朗之感,与陆游《游山西村》“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异曲同工。它们都能让人产生绝处逢生的命运思考,也难免不让人心生人生无常的感慨。“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则很容易让人想到苏轼《题西林壁》“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它们将新奇的意境与深刻的哲理(实际也是诗人各自的人生感悟)融合在一起,给人各种各样的思考与启迪。总之,它们所表达的是诗人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人生哲理感悟。这既是出自诗人内心的生命体验,同时又超越了诗人个体的私性。它是对人类共同生命体验的艺术表达,因而能使人获得某种深刻的人生启迪。

然而,如果一味对情感体验进行抽象、概括的理性化处理,那么诗歌创作就会呈现出其负面影响,最后导致缺乏诗意的情感意味,而只剩下刻板僵硬的议论。事实上,宋诗主流因过于注重表达普遍客观的人类哲理,就忽略了个体私性的意绪感受,结果距离私人“性情”太遥远,而难让人亲近。如苏轼《题沈均琴》谓:“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借琴声有赖于琴和指的谐和来说明事物相互依存的生活哲理。但是,这首诗虽然也运用了形象思维,但并不像《登飞来峰》、《游山西村》、《题西林壁》等诗那样蕴含着对人生的情感体验,它只是以诗的形式来表达一个道理而已,根本就没有多少诗意可言。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如欧阳修《赠无为军李道士二首》云“弹虽在指声在意,听不以耳而以心”、苏轼《和陶读〈山海经〉》云“口耳固多伪,识真要在心”、邵雍《垂柳长吟》云“垂柳有两种,有长有短垂”等等,名虽为诗,实则不过是押韵的议论而已。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谓之“锻炼精而情性远”,^[9]¹⁰⁸⁶严羽斥之“以理为诗”、“以议论为诗”,都切中肯綮。后人之不满宋诗,多少也与此有关。

除了从内容意味上影响诗歌创作外,理学还从思维路向上影响了宋代诗学发展。由于理学(以道学为代表)强调将认识对象置于外在客体地位,因而便与认识主体一分为二,这无疑是将诗人与诗歌作了较清晰的主客二分。于是,诗歌不再是诗人生命体验的一部分,它变成了诗人可以清晰观照审视的对象客体,随之而来的就是对诗歌这一客体对象的冷静理性分析。江西诗学从音韵字句、意象题材等各个方面对诗歌形式进行探讨完全符合理学精神。这固然有助于人们清晰把握诗歌艺术形式,但同时也隐藏着将作诗当作技术操练的严重弊端。事实上,江西末流诗人最后是以技术而非生

命体验作诗。毫无疑问,这有悖于诗歌创作必须表达人们生命体验的诗学精神。对宋代诗学发展而言,这种背离可能是致命缺陷。

然而,宋人并非对活泼流动的言外之意、韵外之致一无所知,毫无所求。如江西诗学就曾提出“韵”范畴来追求文艺作品的韵外之致。“韵”即意味、韵味,它可指形式本身所含蕴的审美意味。范温《潜溪诗眼》解释说:“‘有余意之为韵’……且以文章言之,有巧丽,有雄伟。有奇,有巧……一不备焉,不足以为韵,众善皆备而露才用长,亦不足以为韵。必也备众善而自韬晦,行于简易闲澹之中,而有深远无穷之味,观于世俗,若出寻常……惟陶彭泽体兼众妙,不露锋芒,故曰: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初若散缓不收,反复观之,乃得其奇处;夫绮而腴、与其奇处,韵之所以生,行乎质与癯,而又若散缓不收者,韵于是乎成。’……夫惟曲尽法度,而妙在法度之外,其韵自远。近时学高韵胜者,唯老坡……山谷之悟入在韵,故开辟此妙,成一家之学,宜乎取捷径而径造也。”^[11]³⁷²可见,江西诗学也强调文外有余意、余味。这表明,宋人也意识到对生命情感过度理性制约会束缚鲜活的生命情感,因此,他们试图以“韵”等艺术旨趣来克服对诗“意”过度理性化的制约。然而,意识到并不等于就解决了这一问题。这个问题成为宋诗最大的缺失,它最终也未得到有效解决。

参考文献:

- [1] 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 [2] 罗大经.鹤林玉露[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3] 翁方纲.石洲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4] 程颢,程颢.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 [5] 王安石.王文公文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 [6] 朱熹.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7] 朱熹.大学或问[M].刻版.光绪元年.
- [8] 陆象山,王阳明.象山语录·阳明传习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 [9] 蒋述卓,等.宋代文艺理论集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 [10] 苏轼.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11] 郭绍虞.宋诗话辑佚[M].北京:中华书局,1980.
- [12] 何文焕.历代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13] 徐复观.中国文学论集续编[M].台北:学生书局,1979.

(责任编辑:黄声波)

bold, the aesthetic charm is greatly weakened and it is quite urgent to keep the convention. In this situation, tobacco packing of China should lay emphasis on time limit and the difference in region, national condition, policy and strength when making existence strategies. Design space can be broadened by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jubilant packing, humorous packing, cartoon packing, as well as action-prodding packing, fake-proof packing, suspense-creating packing and fashion packing.

Key words *Frame Convention of Tobacco Control*; tobacco packing; predicament of existence; space of existence; strategy of existence

(5) Origin and Transformation of Novels about Officialdom

HUANG Sheng-bo(038)

Teachers College,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7, China

Abstract As a style of novel, officialdom novel has a long history. Novels of condemna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means the birth of officialdom novel. Political sarcastic novel and comedy in 1930s~1940s in the area ruled by Kuomintang compelled the development of officialdom novel. In the late 1990s, the creation of officialdom novel prospered and two schools, Main Melody School and Official Realism, came into being, which marks the coming of a boom of officialdom novel creation.

Key words novel about officialdom; condemnation novel; Main Melody School; Official Realism

(6) Field Change of Poetry

CHENG Gan(042)

School of Literature,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530001, China

Abstract Field change of poetry, namely, elasticity of poetic language, refers to poets' intentional breaking of grammatical rules. It is also an organized, mediated and constructive destruction of prose language. It is an astonishing discovery in the familiar things that readers pay no attention to and something that people understand through imagination in surprise and confusion.

Key words field change; elasticity; unfamiliarization; effect of distance

(7) Influence of Rationalistic Confucianism in the Song Dynasty on Poetics

CHENG Xiaoping(053)

Chinese Department,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 Economics,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In what aspect does rationalistic Confucianism of the Song Dynasty influence poetics? Opinions vary. In fact, rationalistic Confucian view about nature and sentiment influenced people's thinking in the Song Dynasty. It remoulded the poets' ideology at that time and brought about the unique style of Song poetry. Its influence finds expression in the poetic thought——sense is poetry.

Key words rationalistic Confucianism; nature and sentiment; the thought of "sense being poetry"

(8) OUYANG Xiú's Views abou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EI Yao-chen's Poetry

WU Da-shun(057)

Chinese Department, Huaihua College, Huaihua Hunan 418008, China

Abstract OUYANG Xiú and MEI Yao-chen are life-time poetry friends. OUYANG analysed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hange of MEI's poetry in different stages. In his late years, OUYANG concluded in *Liyi Poetry Talks* that the general character of MEI's poetry is fresh and refined, classical and elegant.

Key words OUYANG Xiú; MEI Yao-chen; poetry style